

上海市社会科学学者文集

Zhao Xiuyi
Wenji
赵修义
文集



上海市社会科学学者文集

Zhao Xiuyi

Wenji

赵修义

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修义文集/赵修义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上海市社会科学学者文集. 第2辑)

ISBN 7-208-04890-8

I. 赵... II. 赵... III. ①赵修义—文集②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6710 号

责任编辑 汤中仁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上海市社会科学学者文集

第二辑

赵修义文集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5 插页 6 字数 387,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4890-8/Z·154

定价 44.00 元



本书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赵修义 1938年生,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第三、四、五届理事,现任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上海市伦理学会理事、上海市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此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1960年代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1970年代末起主要从事现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开设现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经济哲学、经济伦理等课程并指导西方哲学和伦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二十多人。其间,1986—1993年担任哲学系副主任。

研究成果:撰有著作、论文、译著、研究报告等二百多万字。在西方哲学方面着重于19世纪后半期的西方哲学的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世纪西方哲学”课题,其成果——专著《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以问题为中心的断代哲学史》获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教委高校出版社优秀图书奖等多项奖励,

1999 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专著三等奖。此外,还有论文若干篇,其中关于尼采的论文两次获得省部级的奖励。在伦理学方面侧重于经济伦理,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问题的研究。承担多项上海市和国家教委的规划课题。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市场经济、经济学和伦理学》、《经济伦理的研究对象和主要课题》、《试论休谟的经济伦理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生产方式初探》等,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辩护问题》一文入选中宣部 1994 年度“五个一工程”。

自序

这里收录的是本人的主要论文和少量的著作摘要。这些文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期,主要工作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此后的主要工作是在伦理学尤其是在经济伦理方面的研究,其中最为关注的是对市场经济的伦理问题的研究,以及由此而延伸出来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诸多现实问题的探讨。这里将有关背景作一回顾。

一、跨进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

我从 1955 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之后,就跨进了哲学的领域。毕业以后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工作。但是在 80 年代才开始进入真正的学术研究。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的岁月里,几乎丧失了从事正常的学术研究的可能。没有学术的空气,没有自由研究的氛围,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频繁的下乡下厂劳动,没完没了的思想检查,加上沉重的政治压力。“文化大革命”则不仅使我失去了从事教学工作的权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连人身自由也丧失殆尽。惟一积累的就是人生的阅历和对社会的观察力,以及一些读书的心得和头脑里留下的一大堆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文革”结束之后,郭沫若发表《科学的春天》讲话,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心声。心里对春天的来临充满着期望,青年时

代的激情又激发出来了。希冀在步入中年之后,能够有一个安心治学的环境,能够学更多的东西,也能够作出一些独立的研究来。可以说一度是激情满怀。

但是,冷静下来却发现,要作出一点独立的、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对我来说还真是步履维艰。一方面,深感学养不足,另一方面,又深感对自己的思想的清理也极其艰难。

“文革”结束之后,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开始恢复。不久,教育部提出了在师范院校的政治教育系开设“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课程的要求。老领导林远同志授命我准备这一课程,教研室要我把现代外国哲学作为教学和研究方向。受命之时,喜忧参半。喜的是,大学学习期间我最有兴趣的就是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两门学科,工作之后,我也希望教研室让我从事这些方面的教学,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心仪已久,如今实现,不亦乐乎。忧的是,哲学史还有一点基础,对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则是几乎一无所知,完全要从头学起。加之,我从高中就开始学俄语,用俄语阅读,英语只学到初中,再加上自学过一些。要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又不得不重新学习英语。真可以说是白纸一张。跨入这门学科之后,这种忧虑就愈益加重。看看从事这一学科的老同学,不是读过西方哲学的研究生,就是在毕业之后就开始从事西方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有时在同行面前难免会产生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同年轻朋友交谈时我还说过,你们条件好,有希望成为有学养丰厚的学者,我是不行了,像下乡时看到的“僵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僵掉了。与老师辈相比学养太差,读过的“经”实在太少。

忧虑虽在,心犹不甘。在难能可贵的学术春天里,怎么能无所作为呢?惟一的办法,就是狠下心来“恶补”。其间,有近一年的时间,到南京大学参加了教育部委托夏基松先生主持的现代西方哲

学的进修班。一本一本地读原著，一篇一篇地做笔记，一个学派一个学派地加以梳理，向前辈和同行一个一个请教。最初的几年就是在重新学习中度过的。精力都集中在自己学习和讲课上，主要的成果就是厚厚的一叠讲稿和几十本笔记。大约五年的功夫，就是花在“脱毛”上了。“脱毛”的过程使我得以进入这一学科，也站稳了讲台，把这一门课程建设起来了。作为课程建设的一个成果，就是与福建师大的戚文藻、华南师大的邓遇芳两位同行一起完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纲要》的撰写。“学然后知不足”。越是有了一些了解，越是感到学养的不足，越是感到有待弄清的问题实在太多。这些问题成为后来选择研究课题的一个依据。

这些问题有学术本身的，也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在现代西方哲学这一学科中间，尤其突出。在建国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现代西方哲学这一学科是一个被高压电网团团围住的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打开了禁区。1979年在太原召开的有两百多人参加的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成立了中华外国哲学学会。这成为现代外国哲学这一学科取得合法地位的一个标志。但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的西方哲学，如何评价，如何对待，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接下来的两次年会，尤其是1982年在庐山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讨论会，就出现了十分激烈的争论。西方现代哲学究竟是西方哲学走向没落和衰亡的反映，还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西方哲学是不是在发展到英国经验论、大陆唯理论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后就从顶峰上跌落下来，陷入了非理性的泥坑？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西方哲学在理论思维方面还有没有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如何？如何看待哲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西方哲学是否纯粹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有无学术的价值？如何看待国内的思潮起伏与西方哲学的影响？等等，等等，尖锐地

摆在我们面前。当时,这些争论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争论,而且涉及意识形态,甚至涉及政治,不时还会上纲上线。庐山会议上学会的一位理事起初被地方当局取消参会资格,经学会努力后得以赴会,但又被规劝不要发言,这使得整个会议弥漫着凝重的气氛。大会讨论时,充满着浓烈的火药味。比如,有人就指责把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称为现代西方哲学也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有人指责对萨特表示敬重的学者丧失了国格人格,凡此等等,至今令人难以释怀。面对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一个受过多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严肃的学术工作者,又不能不直面这些问题,既要关注和参与,又要作深入的独立的思考。

这种思考相当沉重,也相当艰难。不仅因为兹事体大,而且因为要触及自己的灵魂,要像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从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我们这一代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理论工作者,从青年时代起接受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熟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对马克思主义是十分景仰的。但是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从苏联传来的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又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吮吸着教条主义的乳汁长大的。记得我们进入大学之初,用的就是莫斯科大学的教学大纲,读的是苏联专家的讲稿和苏联的教材(像亚历山大罗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权威的工具书是尤金、罗森塔尔的《哲学辞典》。西方哲学史是按照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来传授的。尽管后来有些变化,对一些具体的人物和观点的评价有所改变,但是教条主义的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清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哲学史研究中日丹诺夫定义的框架,经过1978年黄山召开的外国哲学史讨论会终于被突破了。但是,真正涉及到具体的领域,特别是在现代西方哲学的领域中,还有许多

禁区,还有许多被视为不可逾越的定论,更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澄清。我们自己的思想上也有许多框框有待清理。

这里除了学术观点之外,精神状态也是一大问题。青年时代,年少气盛,思想活跃。我们北大哲学系 55 级的同窗又都好学深思,独立思考,喜辩好争,还十分关心世事和国事,不时会提出各种疑问,发表种种看法。但是,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的学术和思想的批判,学术的不同见解常常会被在政治上上纲上线,使得我们几乎是在不断地接受批判和做检讨中度过了二十年的光阴。不但挫伤了勇气和锐气,而且自信心也大为削弱,常常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会想错说错写错。“文革”结束之后,环境有了些改善,但是当时的政治空气还是反反复复。“心有余悸”,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心态。那时,流行的说法是“讲话是气体,文字是固体”。言下之意是还是少说少写为好,要写的话也要处处小心。有的友人告诫我,现代西方哲学是高压电,最好少去碰它,尤其是在评价上,还是不要去讲什么新话。到底是积极的投入,在投入中去辨别是非,寻求真理,提高自己的认识,还是退避三舍,人云亦云?确实是摆在面前的一大问题。经过反复思考,觉得还是要投入进去,否则就枉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了。所以,自 1979 年之后,每一次西方哲学学会的年会,我都争取去参加。在会议的进程中,认真地听取各种观点,积极地参与讨论,不回避各种有争议的话题,发表已经考虑得比较成熟的看法。这种做法当然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有时小组会上的发言竟会传到千里之外,引起种种议论,不赞成的会找一些理由来贬损你,甚至设法不让你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但是麻烦也好,争论也好,都只能砥砺意志,使思想更为活跃。

况且,自信心的获得也只有在参与之中才有可能。记得在粉碎“四人帮”不久,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四人帮”的思想特征是

教条主义，并引用列宁对第二国际的批判作为依据，提出清算“四人帮”要反对教条主义的主张。送给刊物之后，编辑告诉我，审稿者认为是奇谈怪论。后来只好用曲笔，就《列宁选集》等经典著作中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一词的翻译写了一篇小文章，委婉地批评多年来一直回避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这才得以发表。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之后，对教条主义的批评就合法化了。通过这一经历，也就找回了自信心。

凭着这种自信心，在提高学养的过程中，开始梳理现代西方哲学演进的脉络，并作一些个案的研究，如尼采和柏格森。记得当时冯契先生曾告诫我们，像哲学史这样的学科，不要匆匆忙忙地写文章，没有五年的积累，是写不出什么像样的文章来的。所以，文章写得很少，精力还是放在教学，放在积累知识和自己理清思想上。这就是 80 年代上半期的工作状况。主要目的还是探究如何把握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方法论，以回答上面提到的那些涉及现代西方哲学的总体评价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种种问题。

当时得出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承认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了解和研究是非常粗浅的。依据对个别人物和个别流派的初步的甚至是相当片面的了解，就匆匆忙忙地作出判断和评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也不能把苏联学者们过去所作的介绍和评价，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定论，更不能把它视为金科玉律。就我对尼采的文本的粗粗阅读来说，以往苏联哲学界的评价，就是指其为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思想家，而他们对尼采的一些概念的界说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往往与尼采的文本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充分地占有材料，要有可靠的文本和历史的依据。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已有的结论或成见出发。

其次，黑格尔以后的西方哲学，无论就其对时代问题的回答，

还是就其对人类理论思维的成果的总结来说,都是西方哲学的新的阶段。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西方哲学本身的情况又十分复杂,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方法,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也不能用政治的批判来代替学术的批评。

第三,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特点是,从总体上看,已经与西方的传统哲学有很大的区别。各个不同的流派,对哲学的对象和任务的理解已经与传统哲学大相径庭,各自有自己的问题域。因此首要的问题是理解和梳理他们对哲学自身的看法,以及思考的出发点和不同的进路。倘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来剪裁它们,然后再用剪裁出来的一个一个论点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对照,并以此作为评论其是非功过的依据,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

《现代西方哲学纲要》就是按照这样一些认识来撰写的。用力最多的地方就是对不同流派、不同的哲学家本人的思想进路的梳理,以及尽可能地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作一些必要的分析和评论,并体现出教学的特点。当然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无论对资料的把握和理解,还是对问题的分析,都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地方甚至显得有点幼稚。但是从对哲学对象的不同理解去区分和梳理众多的流派,还是可取的。主要的收获还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总体特征的把握,以及对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这些认识归结起来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 19 世纪的中叶,西方哲学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一转折不是在个别的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也不仅是提出了许多传统哲学没有提出的问题,而是整个问题系的变化,或者说是哲学的主题的转换。只有把这一转折、这一主题的转换搞清楚了,对于后来的西方哲学演进的脉络梳理清楚了,才能给各种不同的流派和人物以一个恰当的定位。由此看来,既然主题已经发生了转换,

那么用传统哲学的框架来解读西方现代哲学就是不合适的。

第二,马克思看待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就是“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主题的转换必须放在那个时代的特殊的背景下去考察。而所谓的时代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的发展,包括科学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一个是哲学自身的逻辑发展所提出的问题。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需要放在时代问题这一共同的背景下去考察。教条主义的方法的一个特征,就是离开了具体的时代,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与西方哲学家的论说作简单的对照。

后来经过反复的思考,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同时代性”的命题,以此作为破除西方哲学研究中教条主义的突破口。其内容主要体现在 1986 年贵阳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上宣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同时代性》一文中。这一命题的提出得到了一些同龄的学界同仁的首肯,也得到了冯契先生等前辈的赞同,认为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这一命题后来成为我研究 19 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的视角。

《纲要》的撰写是与教学同步的。从 1980 年结束了在南京大学的进修之后,我就给 77 级开设这一课程。此时适逢《中国青年》杂志开展关于潘晓的信的大讨论。社会思潮十分活跃,在思想敏锐又有相当阅历的老三届大学生中尤其突出。所以,教学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哲学知识的传授过程,也是同学生的各种思想交流的过程。大学生对西方哲学的关注和兴趣不仅仅是学术的、学理的,而且是同他们对现实,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尤其是刚刚结束的“文革”以及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对自己的经历的思考和总结,对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探索和思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980 年萨特

的去世引发了对萨特的介绍和纪念,不久就演变成一场“萨特热”,就是一个明证。后来,紧接着又出现了“尼采热”、“弗洛伊德热”、“人学热”和“中西文化热”。热点虽然不断转移,但是对西方哲学和思潮的热衷却持续不断。这是 80 年代大学校园的一大景观。这一景观,对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了许许多多尖锐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如何看待西方哲学与西方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西方哲学在中国引起的反响?中国社会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动到底是西方哲学引入所引发的单向度的影响,还是主要缘起于中国的现实?西方哲学所产生的影响是否纯粹是消极的?当时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青年学生中间的思潮的起伏主要是西方哲学的影响,而西方哲学的影响又主要是消极的影响。这种看法相当普遍。因此,每当社会上对这种思潮的活跃产生忧虑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对西方哲学研究者的责难。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之后的几次年会上所发生的激烈争论,都反映出这一点。庐山会议尤甚。一个少见的现象是,有不少新闻出版界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人士与会。其中有些人士比学者还要活跃。一些十分尖锐的上纲上线的批评,大都是他们提出的。其原因就是他们的兴趣不在学理上,也不在方法论上,而是在意识形态上。核心的问题就是把社会上的一些思潮,尤其是他们认为是消极的思潮都归结为西方哲学的影响。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中国学界对西方哲学的译介和介绍,尤其是其中一些肯定性的评论。

面对这一现实,不能不对现代西方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作出认真的思考。由于大学时代老师们潜移默化的熏陶,加上师范大学重视教学的氛围,使得我对教学养成了一种几乎虔诚的态度,不仅首重教学,而且对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总是萦怀心中,挥之不去。思考的核心问题还是如何克服苏联传来的教条主义。长期以来,苏联的学术界往往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来代替对

西方哲学的学术研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又往往是非常独断地从现代西方哲学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先验的假定出发,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而且常常把有深刻内部根源的国内思潮的起伏归结为外来的影响,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影响,以为这样才算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谬种流传,在中国也积习甚深。由于我们对西方哲学在西方社会思潮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生的作用的评价,许多是直接来自苏联人的著作,人们往往会把这些结论作为定论,一旦违背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

要摆脱这种积习,对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也需要相当痛苦的自我反省,既需要梳理过去的认识和思想,又需要作许多切实的研究,尽可能地了解客观真实的情况,还需要对现实的思潮作出认真的观察和审慎的分析。经过几年的思考,我感到,哲学作为一种时代精神,无疑会集中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做意识形态的分析和审视,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西方哲学流派众多,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又各有不同的处境和立场,所以,需要对于具体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不能从先验的假设出发,更不能采取一锅煮的办法。无论是被归入科学主义潮流的思想家,还是被归入非理性主义潮流的思想家,都需要这种审慎的具体的分析。此其一。第二,思想家哲学家本人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他们本人的立场和主观态度是一回事,他们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由于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往往又是一回事。两者是有联系的,但是未必是一致的,需要作仔细的辨析。第三,哲学家在学理上作出的探索和贡献与其意识形态的效应往往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情况,即使是在意识形态上需要批判或否定的哲学家,也可能有学理上的成就,值得借鉴,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即使是对社会和历史问题,他们往往也会有深刻的洞见。如列宁所说:马克思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反动分子(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学说

中包含有关于政治事件更替的规律性和阶级斗争的深刻思想”^①。第三,社会上、校园里出现的各种思潮的涌动,主要是当时中国社会发 展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的反映,是人们对这些问题所作的思考的集中表现。对某些西方哲学流派的热衷,对某些西方思潮的推崇,往往是有了问题和看法以后,才从西方的思潮和学说中寻求理论的支撑,寻求借鉴的。这从“萨特热”中就可以看出。“萨特热”兴起之时,国人对萨特的了解是极其肤浅的。当时能够读到的萨特的文本,非常有限。只有一些小说和剧本,还有就是周煦良先生翻译的一个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且是刊登在一个发行量不大的文艺评论杂志上的。此外,还有“文革”以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存在主义的译文选编和《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一分册。这些都是限量内部发行的,一般的读者是不易读到的。外文的文献也是不易寻觅的。当然,国外的哲学引进之后在社会上确实会产生影响,会引起思考,使人得到借鉴,有些观点甚至会引起共鸣。但是这些借鉴和共鸣是在中国特有的情境下,经过人们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才产生作用的。作为专业的哲学工作者,理应关注这些国内思潮的动向,认真地去辨析这些思潮,并且尽可能地去推动它的健康发展。为此,需要发挥专业的特长,通过客观的研究,让社会上了解这些哲学和思潮的真实情况,它们的理论来源、具体历史背景以及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无疑,作为研究者本身也会对这些哲学和思潮作出自己的评价和分析,会有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可以提出来与学生和读者进行对话、讨论和交流。但是,这是一种平等的对话,而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独断的评判。记得在庐山的会议上,有一位同仁提出,我们既不当乞丐,也不当灭火队。这句话说出了我们当时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与社会思潮的关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0卷第197页。